師表

馮進

接到訃告，趙元任和楊步偉的長女卞趙如蘭（Rulan Iris Chao Pian，一九二二——二〇一三）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哈佛大學所在地）去世，終年九十一歲。趙如蘭生前是著名音樂學者，她有關宋代音樂史的著述爲中國古代音樂研究作出突破性貢獻。她也曾在台灣、大陸、香港各地從事京劇和口述文學的田野工作，並在美國創立名爲「中國口述和表演文學會議」的研究組織，彌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從一九四七到一九九二年，她在哈佛大學教漢語、中國音樂史和文化，並於一九七四年晉升爲教授，是哈佛最早的女教授之一。

趙如蘭被後人敬仰不光因爲她的學術成就，更是她獎掖後輩，促進中國文化研究在海外發展的重大功績。她在哈佛大學教授漢語，繼承父業，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教學方法和系統，培養了許多鼎鼎大名的美國漢學家：如傅高義（Ezra Vogel）、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林佩瑞（Perry Link）等。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放後，她又是首批應邀訪華、講授中國音樂史的美國學者之一，將西方最新的音樂理論和研究方法傳播到大陸。二〇〇九年她更將一生收藏的五千五百多種音像資料以及二百五十多箱書籍和文稿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

二〇〇四年一月，我去耶魯大學神學院檔案館查檔，研究早期中國留美學生生活，特地去劍橋拜會趙先生，所以有幸識荊。我從老師梅儀慈教授處獲得趙先生的信息、冒昧聯繫，是因爲當時正寫一篇關於她母親楊步偉女士自傳的文章。趙先生和她的丈夫卞學鐘（麻省理工學院航天工程系退休教授）做東，請我在當地一家中餐館吃飯。老夫妻二人年已耄耋，對我這樣一個素不相識的後輩卻慇勤接待，盛情很可感念。記得趙先生中等身材，短髮，聲音柔和，說話總是笑瞇瞇的，對我許多唐突的問題不以爲忤。卞教授開車，吃完飯又將我接到他們家小坐。他外貌清健，但有時手會不受控制地顫動，讓我擔心他的身體。

坐在她家客廳的沙發上，我從發黃的相片裡看到他們夫婦的故交青年時代的倩影，例如陳衡哲的長女任以都教授的新婚照。聽趙先生通過後輩的眼光，隔着將近一個世紀的時空來緬懷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大人物也別有風味。她說，當年父母的相處模式是母親爽快善言，父親沉默寡言，不過對四個女兒的教育他們的意見一致。她在哈佛音樂系獲得終身教授時，父親雖不多話，卻非常高興，全家都爲此慶祝。但除此之外，她對自己的學術、教學成就卻不願多談。如今想來，我錯過了一次深入了解她個人經歷的機會。據趙先生的朋友回憶，他們老兩口結縭半個世紀的歲月中，經常招待來訪的華人學者，家裡的藏書任君閱讀；圍繞着壁爐的談話持續到深夜時，主人另有夜宵饗客。八十年代，這樣的集會演化爲每月一次的「康橋新語」聚會，東道主邀請中國或美國的著名學者前來講話，並主持討論，經常吸引五六十名觀衆，把房子裡擠得滿滿的。最後，又是趙先生捧出一大鍋紅豆稀飯，讓大家在寒冷的冬夜裡溫暖身心。

斯人已逝。但今日回想，趙先生謙沖和藹，循循善誘的面貌猶在眼前。因爲有那一面之緣，趙先生於我不僅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抽象的名字，更是可敬的學界榜樣，可親的前輩師長。

向惡而生

凸凹

去年「十一」小長假，讀法國當代作家揚·蓋菲雷克獲一九八五年龔古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野蠻的婚禮》（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二月版）。

本是爲了消閒，卻讀出了沉重，掩卷沉思，痛恨人性之惡。

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二戰後的一個法國港口城市。戰爭給人以創傷，水手們放縱自己，上岸尋歡作樂。他們誘騙一個僅有十四歲的叫妮柯爾的少女上船，於酒後將其輪姦。妮柯爾不幸懷孕，產下一子，叫呂多。不可言說的心靈屈辱，使妮柯爾母性淪喪，把一切痛苦都發泄在無辜的呂多身上。呂多被母親遺棄，四處流浪，飽受虐待，久經磨難。呂多渴望母愛，用書信傾訴思念之情，雖從未收到回信，卻從不間斷。其筆致極盡柔情，催人淚下。母終於被喚回了惻隱之心，答應與之相見。但見面之後，面對被生活摧殘得不成人樣的呂多，妮柯爾溫情難起，露出毫無遮掩的厭惡。幻想破滅之後，呂多被母親喋喋不休的斥責激怒，將其扼死。隨後呂多緊抱着母親的屍體投入大海，在大海黑暗的懷抱裡，他找到了生命最終的溫柔。他笑了。

故事情節雖然簡單，但是，它卻涉及到了一個重大的主題，即：影響發生之後。

戰爭的創傷作用於水手——水手的施暴作用於妮柯爾——妮柯爾的屈辱作用於無辜的呂多。影響一旦發生，就是個不可收束的連鎖反應，一如諾米亞骨牌的傾倒，不可拯救。

不禁聯想到哈羅德·布洛姆《影響的焦慮》。他雖然闡述的是「詩」的發生史，卻也深刻地揭示出，人的精神（心靈）一旦受了外在的影響，它就改變了原有的路徑，在反抗影響的同時，心靈焦慮並扭曲，痛苦不約而至，而且纏繞不去。

這一點，王爾德《多林·格雷的畫像》的主人公亨利·沃頓爵士從自己的遭遇中也有深刻的感悟，他說，影響一旦作用在一個人身上，他便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他的美德也不再眞正屬於他自己，甚至他的罪孽，也是抄襲來的。他完全成了另一個人奏出的音樂的回聲，他無意識地扮演着別人強加給他的角色。所以，他認爲，一切強加給別人的影響，都是不道德的，都是罪惡。

「影響」的這種不可逆轉性質，讓我們驚悚，也讓我們警醒——

「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爲之」，中國的傳統哲學，有偉大的人性光芒。因爲小惡雖微，卻是惡的起點，累積與傳遞，會變成土壤，會釀成大惡，危害所有的人。

不要草率地介入別人的生活，也不要讓別人輕易地進入自己的生活，這是最起碼的人生態度。除非你有承擔責任的能力和意志，除非你有承受苦難的準備和耐心，否則你就關緊門扉，憫人善己。一次出軌之愛，會欠下無法償還的情債，本金和利息，滾到最後，是個大數目，會壓斷你的神經。一次錯誤的接納，會招致得寸進尺的追索，你要不斷滿足對方的願望，到了最後，你疲於應付，一生被毀……這是生活現實早已給出的生動例證。於是，理性的處事態度，是向惡而生，每次反省，都要看準惡潛伏的位置，不盲目、盲從、盲動，都要有清醒的預案予以提防，讓善良無後顧之憂，從而善始善終。這一如西方的法律，立法的前提，是人性之惡。

不是我們膽小，而是這個社會多了戾氣，街上多了狼犬，總是覬覦別人的利益，以傷害他人爲樂。因此，雖然我們內心溫柔，對世界充滿積極態度，但還是要加十二分的小心，走出屋外，我們不僅要時時擦亮眼睛，而且手中也要時時握着一根棍子——文明時，它是枴杖；危急時，它是防身利器。

《野蠻的婚禮》中有一個令人心碎的細節——妮柯爾赴水手之約時，對愛情的美好期待，使她羞於沒有一雙能穿得出的鞋子，於是便偷了母親的一雙皮鞋。鞋子有些不跟腳，她便蹺足而行，使身子更加搖曳多姿。她就是這樣，天眞浪漫地走進了虎口，成了惡人口中的一道美食。

那一刻，我在扼腕痛惜的同時，心中也生出一聲深重的吶喊：人們啊，愼用你們的善良吧，人間之惡，正是被你們的無心之善所餵肥！

政府的大門

肖飛

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正逢「文革」，那時社會上對舊時的官衙批判最多，有句耳熟能詳的順口溜，「小小衙門八子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意思是說，在解放前，無錢無勢的老百姓是根本進不了官府大院的。這導致百姓對官府大門有種膽怯，即便到了現在，人們也不敢輕易地探進頭去，生怕遭到訓斥。而今，政府厚重的大門在有些地方有種漸漸開啓的跡象。

南京市委、市政府從今年起，每年的一月一日、五月一日、十月一日爲「公衆開放日」，市民只要辦理登記手續就可進入參觀。元旦一早，我專門去探看虛實，一大早就已經有很多的市民在門口等待進入，很多的民警不得不來維持秩序。以前也看過類似的新聞，弄得聲勢很大，其實只不過是配合某個親民活動臨時設立，時間一久，就不會再搞。百姓誠惶誠恐地進去觀看，像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現在，南京市委、市府將全年的開放日公布於衆，說出的話收不回來，看來，「衙門」眞的要向市民打開。只是一年僅開放三天，有點意猶未盡，不免有小小的遺憾。

南京市委、市府辦公地位於城東的北京東路雞籠山南麓，是一處重要的文物保護單位。民國時期這裡是國民政府所在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市府搬到這裡辦公。這裡的前身是專門供奉武夫子關羽的武廟，明初，朱元璋下詔興建十座廟宇，其中最爲壯麗輝煌的就是武廟，至今尚存大殿、配殿等建築。在古代，一個成規模的城市，一般都會設武廟和文廟，南京的文廟便是位於秦淮河邊的夫子廟，十分出名。民國時期，武廟曾經是國民政府考試院銓敘部辦公地點。考試院是國民政府最高考試機構，成立於一九三〇年一月。直到一九四九年，戴季陶和張伯苓先後擔任考試院院長。這期間，又興建了不少仿古民國建築，包括東大門、寧遠樓、華林館、寶章閣、孔子問禮圖碑亭、明志樓、衡鑒樓、公明堂等。如今，這裡已被列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一帶的風景極好，有九華山、雞鳴寺、台城、玄武湖以及中山陵景區。登上台城一望，山水城林，佛音繚繞。五代時的梁武帝就是在附近當的皇帝，因篤信佛教，幾度躲進廟裡不肯出來，弄得皇室只能花重金爲他贖身，最終遭侯景之亂，餓死在台城。可以說，這裡的景點等級絕不在秦淮河、夫子廟之下，但長期以來，卻鎖在深閨人未識，人們只能在門口的武廟遺址石碑前照相留念。

我住在附近三十餘年，對這裡的環境之美愛之尤深。記憶中進市府大院辦過兩次公事，都是坐着公家的車子進入。在國內的政府大院，通常是看車不看人。由於是公辦，事情辦完也就匆匆離去，不曾有遊覽的雅興。即便有時間，也切不可往一幢幢古建裡東張西望或掏出相機亂拍，弄得不好，會被別人盤查，自討無趣。等開放日正常後，確是可以進去好好地看看，深入地了解長期被封閉着的歷史和寂寞的古建。

實行政府辦公地開放日活動是個世界性趨勢，在美國，民衆都可以按照規定的時間進入各級地方政府免費參觀。一九六九年馬薩諸塞州議會通過法案，成立州議會大廈導遊部門，由議會大廈員工或志願者擔任導遊，向民衆講解議會大廈的歷史、建築風格等。美國國會特別設立訪客參觀中心，每二十人左右分成一組，由一位訓練有素的導遊帶領，進入國會參觀。「九·一一」事件前，白宮也可以隨時參觀，後出於安全考慮，改爲事先預約。在法國專門有兩天的「遺產日」，當日，全國所有具有歷史文化觀賞價值的文物古蹟、博物館、紀念館、教堂等都對全世界公民開放，即便是法國總統府愛麗舍宮、總理府馬提翁宮、國民議會波旁宮、參議院盧森堡宮等，都得對公衆開放，各部門的主人都會親自在院內歡迎參觀者，有時還客串講解。作爲香港特首官邸的禮賓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對市民開放。每年的三四月間，是香港杜鵑花盛開的日子，市民可以到禮賓府內觀賞，了解特首的生活。前特首曾蔭權還做過導賞員，爲公衆作導遊。相信國內設立開放日的政府大院會越來越多，這些權利集中地也會成爲一個城市重要的景觀地帶。

自古以來，我國的民衆都有種畏上的心態，潛意識裡對官員懼怕三分，正是由於這種官貴民輕的風氣，進一步加深了這種隔閡。消除這些隔閡，除了要從政策制度上修復外，更要從日常的行爲上親民。習近平總書記到路邊的包子店花錢用餐，便是最爲眞切的親民行爲。當市民可以抬腳跨越一座座政府大院的門檻時，心理距離就自然會被拉近。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眼睛看官衙的深淺，品政府的作風，這樣的「開放日」正是一個不錯的政府公關活動，通過「主動出擊」，組織豐富的活動，讓群衆對政府有更多的了解，也就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理解。再者，我國的許多政府院落本來就是很有歷史積澱的景區，一直以來只是成爲一部分特有階層的專享，平民百姓即便花錢也不可能進去遊覽，這就形成了強烈的官民利益反差，在強調以民爲本的時代，讓百姓共同享有遊覽權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仙人球（攝影） 念慈攝

印度「手抓飯」

胡茂全

我受公司委派，到印度參與一項水電工程的建設。初到新德里，我便被大街上濃郁的印度風情所吸引，男人用布包裹頭，穿着傳統的素色長袍；女性則個個服裝艷麗，顏色五彩繽紛，圖案千變萬化。有的富麗華貴，有的典雅大方，有的鮮艷奪目，有的素雅宜人，有的端莊嫵媚，再配上耳環、鼻環、頭飾、手鐲、戒指、項鏈、腳鐲、腳鈴等，走起路來娉娉婷婷婀娜多姿，別有一番風韻。

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我和印方負責人辛格很是投緣。印度人對待朋友很熱情，辛格邀我去家中做客。在印度聽說熟人間吃飯則沒這麼多講究，可以親密到吃手抓飯的程度，我一直對這種獨特的進餐方式很好奇，沒想到自己眞遇到了。同大部分印度家庭一樣，辛格家的門旁放着一個水罐，裡面浮着幾粒豆蔻，有一種特殊的清香，我模仿他們的樣子先洗手。

「手抓飯」是印度人長久以來的就餐習俗，印度人請客時很少圍坐在餐桌邊，而是把各種飯菜通通擺放到餐桌上，客人或站或坐，有共同話題的人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完全不像我們那樣，一大幫人圍着桌子喝酒猜拳，喜歡製造氣氛。

在國內，我也喜歡親自下廚，我們中國菜講究「清清爽爽」，色香味俱全，色在第一位，菜色分明才能激發食欲；而印度菜則「糊糊塗塗」，各種主菜、蔬菜都搗成糊狀，統統灑上一大把咖喱粉，看起來都是一種顏色。葷食如不親口嘗一嘗，很難區分是什麼東西，雞鴨魚肉盡失本味，簡直有些暴殄天物。

印度人的主食除了麵餅，還有米飯。他們喜歡吃的並非我們常吃的白米飯，而是把飯煮熟後，放些油和調料，把飯弄成黃色，或者同別的什麼菜炒在一塊，弄得層次不分。印度人抓飯時大多只用拇指、食指和中指。他們先用這三個手指伸直按在麵餅邊緣，成三股叉狀，然後中指使力成彎曲狀，壓住餅子不動，拇指和食指一齊用力撕下一小塊麵餅，接着三根手指協同作戰，用餅子將菜包住，最後捏住送入口中，捏的動作就像用鉗子夾住一樣東西。

印度人吃飯還有一個規矩，無論大人還是孩子，一定要用右手吃飯，給別人遞食物、餐具，更得用右手。因爲印度人如廁，不用手紙擦，而是用水沖洗，沖洗時，用左手，不用右手。所以他們認爲左手不潔淨，吃飯時左手只能放在膝蓋上。

這個習俗讓我叫苦不迭，辛格的朋友們見我老用左手抓飯，頗感怪異，沖我只皺眉。好在辛格知道我是個左撇子，替我解釋，又因我是外國人，他們並無過多指責。在印度，南方人用整個右手抓食物，而北方人則比較斯文一些，用手指的前兩個關節，直接把食物放到嘴裡，是印度的傳統習俗。我努力做到入鄉隨俗，但手指卻不是很麻利，於是便五根手指一齊上陣。米飯吃完之後，我還將沾滿油膩的指頭逐個放入口中吮吸，徹底舔乾淨之後才肯罷手。

原來，辛格堅持請我吃手抓飯，是因爲印度人認爲吃飯來自觸覺，刀叉和筷子阻止了這種觸覺，所以也就阻卻了人類特有的快感。我一邊抓飯，一邊想：爲什麼小時候老媽每做好一盆菜，我偷偷抓來嘗一口遠比正餐時吃的香甜，可能也是這種緣故吧！

大師另一面

賀有德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朱自清是著名散文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先生一生，既從文，亦從教——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歷來享有盛名。但是，從文也罷，從教也罷，皆有鮮爲人知的另一面。

在文學上，朱自清精於散文，其作品大致分爲三類：以《背影》、《兒女》爲代表的人情類散文，以《荷塘月色》、《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爲代表的景物類散文，還有敘事性與抒情性小品。郁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現代散文導論》中盛讚其散文創作：「……他的散文仍能夠貯滿那一種詩意，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然而，台灣詩人與評論家余光中，以朱自清的傳世作品爲例，娓娓道出了對朱自清散文的「另類」看法：「想像不夠充沛」，因此，寫景「欠缺開闊吞吐之勢」；「節奏慢，調門平，情緒穩，境界是和風細雨，不是蘇海韓潮」；章法有條不紊，但「很少採用逆序和旁敲側擊柳暗花明的手法」；「句法變化少，有時嫌大俚俗繁瑣，且帶點歐化」；「譬喻過分明顯，形象的取材過分狹隘」；談到感性，仍然停留在農業時代，「太軟大舊」；在其創作歲月，「產量不豐、變化不多」。

細品余光中「另類」評判，再品朱自清散文，似乎並非空穴來風。據此，余光中認爲：朱自清不能稱爲散文大家，只能稱爲「優秀的散文家」。作爲教授，朱自清堪稱「嚴師」。在清華大學，上課總帶着一疊卡片，要求學生按時交作業，還安排種種考試。即使胃病已很嚴重，「課堂上板書一筆一畫從不潦草」，批改學生的讀書報告或學術論文，「一句話，一個標點，他都從不放過」。在西南聯大，連對學生的作業格式都有具體規定。學生慨嘆，選他的課是「自討苦吃」。

然而，朱自清雖然從教多年，還曾參加「五四」時期「平民教育講演團」，可是走進課堂仍然緊張，甚至時時「用手帕揩汗」，一旦說錯，更是「現出窘迫甚至慌亂的神色」。而且，一直有個缺點，引述別人的多，個人見解少，因此選課的學生極少；極端的時候，只有研究生王瑤一人聽課。某次，連王瑤也沒有來，朱自清只好悻悻而退……

大師也是這樣，有其不平凡的一面，也有「不合格」的另一面。

懂得

馬亞偉

我剛參加工作那年，幹工作總喜歡標新立異。在單位，我是個特立獨行的角色。有一次，我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沒和別人商量，就用自己的方式幹了起來。單位很多人不屑於我的工作方式，有人甚至說，無知者無畏，她這樣幹下去，遲早會慘敗的。正當我彷徨的時候，單位有個人對我說：「其實，我懂得你的工作思路。」接着，他把自己的理解說了出來，竟然完全和我想的一樣。他說：「你這樣做雖然有點風險，但是你這個人的優勢是考慮事情比較全面，如果謹愼一點，這件事你一定能幹得很漂亮的。」那時，我覺得自己遇到了知音，他完全懂我。在他的鼓勵下，我果然把工作做得很好。後來，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的朋友。

遇上懂得自己的人，是一種幸運。生活中，丈夫經常挑剔我這樣、那樣的毛病，說我不像別的女人一樣耐心細緻。有一次，我們一起聊天，他突然說：「其實呢，你的那些小毛病都微不足道。而你的優點是別的女人一輩子都學不來的，你不虛榮，不功利，不求物質享受而喜歡精神富足，這些優點也是我最喜歡的。」我欣慰極了，他是懂我的。

蝴蝶懂得花兒的芬芳，飛鳥懂得藍天的高度，高山懂得流水的清唱，草木懂得陽光的煦暖……懂得，是一種美麗的緣分。這個世界上，懂得我們的人，不需多，三五個足矣。

收到一大摞郵件，除了一些樣報樣刊，還有一封地址陌生的信。我心裡疑惑，這個時代，書信似乎已經退出了生活，誰會給我寫信？打開來看，發現是一位讀者。

她的信是手寫的，感覺特別親切。信上的字沒有一處勾畫，看得出非常認眞。她在信中說，從雜誌上看到我的文章，然後按上面的電話打給雜誌社，幾經詢問，才得到我的地址。

然後，她說讀到我的文章時的感受，說那篇文章，她至少讀過十遍了，每一次都會有強烈的共鳴，文章中對待人生的態度，對生活的理解，她都非常認可。她的信中也寫到自己的觀點，看到出來，她的文筆很好。

看完她的信，我心中湧起巨大的幸福感。她是懂我的，我的文章終於被懂得的人看到了。那一刻，眞的有怦然心動的感覺。那種感覺，就像是與前世的有緣人在今生重逢一樣，即使素未謀面，僅僅是第一次相見時的一個眼神，就能讓彼此心領神會，頻頻回首，直到彼此相認，說一聲，哦，原來你也在這裡。我只是一個業餘作者，喜歡通過文字表達心靈，能與遠在天涯的有緣人交流，並且心靈相通，眞是幸事。

懂得，眞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因爲懂得，所以珍惜。如果沒人懂得，你永遠是個孤獨的歌者。最遠的距離不是千山萬水，而是你就在我的對面，卻因爲不懂視而不見。高山流水遇知音，如果沒有懂得的人，任憑你的琴彈得多麼優美，弦斷有誰聽？理解俞伯牙摔琴謝知音，那是一種無人共鳴的悲涼和落寞。

因爲有人懂得，我們才不孤單，才有理由在這個世界上活得更加精彩。